

# 再現的政治：解讀媒介對他者負面 建構的策略

倪炎元\*

## 《摘要》

透過建構論的語言觀為基礎，本論文嘗試循三條進路，就媒介文本中有關他者再現的相關理論與策略加以探討。包括從批判語言學的分析進路、符號學的詮釋進路、以及後結構主義的歷史與社會學進路等，並以台灣歷年報紙中若干涉及他者的新聞導言為例加以檢視。本文認為透過上述進路，可以揭露媒介文本中被界定為他者的角色如何被塑造、被發明、甚至被污名化的策略與過程，亦即他者再現的議題即是再現的政治議題。

關鍵詞：再現、他者、迷思、刻板印象、論述

---

投稿日期：1998年4月3日；通過日期：1998年11月3日。

\* 倪炎元為銘傳大學大眾傳播系副教授。

## 壹、前言

隨著媒介研究針對媒介文本遞增的興趣，有關媒介文本中對不同社會角色的「再現」(representation)，也逐漸形成媒介研究的重要焦點之一，在正式進入討論前，本文想先引述幾則從歷年台灣報紙中挑出的幾則新聞報導導言：

範例一：施小寧、張木珠帶了大批武器，從福建沿海的蘇澳地方乘了十二匹馬力的漁船，投奔到馬祖，希望回到自由祖國復興基地過自由人的生活。

(中國時報 1985年10月1日 記者姚琢奇報導)

範例二：大陸偷渡客鄭大成等四名，大年初一從花蓮海岸後，廿四日晚深夜投靠友人恒春鎮民蔡茂強時為警查獲，鄭大成供稱是來台打工，警訊後送新竹大陸非法入境收留中心處理，至於涉嫌藏匿人犯的蔡茂強依法移送法辦。

(中國時報 1994年1月26日 屏東訊)

範例三：我國民生富裕，人民生活水準提高，賺錢容易，已成為外籍勞工打工的天堂，許多的外籍婦女，紛紛以與我國男子結婚的手段，達到合法長期在台打工的目的，此舉勢將對我國人口品質、人口壓力及社會、文化結構造成不良之影響。

(中國時報 1991年12月11日 記者方寶柱報導)

範例四：由於觀念差異及天生「條件」使然，花蓮縣山地少女淪落風塵一事，早已「名聞」全省，來自各地到此尋找適當「貨色」者，屢見不鮮，許多「求才」的識途老馬，更能清楚的摸對門路，談妥時價，快速成交，因為經驗豐富不留證據，且不定點物色對象，致使有關單位徒嘆破獲不易。

(自立晚報 1986年11月8日 記者吳明珠報導)

範例五：臺塑企業高雄企武廠被免職的員工，昨日在臺塑南區七個工會

代表支持下，一百多人到臺塑臺北總公司門前抗爭，指責臺塑非法解僱，資方應儘速付給員工資遣費。臺塑表示，該公司所做決定一切合法，臺塑不會被逼迫讓步。

（中央日報 1992年10月22日 記者周慶祥報導）

範例六：英雄，美人！才剛開訓，成功嶺大專女生第一連的龐嘉綾，就被公認為「成功嶺之花」。只要提到「龐嘉綾」三字，連教育部長吳京都情不自禁地開玩笑的說，「你們不要搶，我已經決定留給我二兒子（當媳婦）了！」

（中時晚報 1997年1月20日 記者韓國棟報導）

範例七：二名前科累累的強盜犯張世男、陳志誠，今天凌晨一時四十分許，持開山刀闖入桃縣八德市重慶街的一棟民宅，但屋內三名來自蘭嶼的原住民，不甘打零工辛苦所得遭劫，奮力奪下張、陳二人的刀械反抗，張、陳二人不敵反遭殺死，而三名原住民青年也都分受輕重傷。

（中時晚報 1998年3月14日 記者鄭滄杰報導）

上述幾則報導導言，雖然在新聞類型與性質上完全不同，但有一點共同處是他們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在向閱聽人建構一種涉及「他者」的媒介文本。範例一與範例二主要是在作對比，它呈現同一種角色從反共義士到偷渡客的轉變，特別是從「我群」到「他者」的轉變；範例三所涉及的角色是女性外籍勞工、範例四是原住民雛妓、範例五是勞工、範例六是大專女生，這些範例分別涉及了國族／種族／階級／性別等類目的區隔，也分別呈現了他們被不同符號標籤化方式，更塑造一組操作符碼（code）所塑造的歷史、政治與社會脈絡，用簡單的方式說，上述這些被選出的報導都是台灣報紙媒體對相對於主流社會的「他者」（the others），以報導體的語言所塑造的一種「再現」。

在進一步解讀上述幾則新聞導言之前，本論文將就新聞媒介文本中針對「他者」再現的理論與方法論問題，做一個嘗試性的梳理，由於不論是針對「他者」或是針對「再現」的討論，都牽涉了無數學科領域，部分學科領域內又有流派的分歧，深入檢視非本文所能負載，在這裡僅專就與媒介相關的著作加以檢視。

## 貳、他者與再現

在媒介文本中，誰在芸芸眾生被劃定他者？為什麼？被判定為他者後又如何被建構並再現於媒介文本中？這是探討媒介的再現政治所關懷的核心主題，不過在進一步進入我們的主題以前，必須先確立本文對語言與真實世界的關係的基本假設，即是主張語言並非如同鏡射般的反映真實世界，而是在建構真實世界；亦即當我們追問他者的意義時，我們認為他者之所以成為他者，其意義不是源自於他者的本身，而是我們透過語言的概念與符號所建構、所生產出來的，在這裡我們稱之為再現的建構途徑（constructionist approach）。很明顯的，此一基本立場與傳統上對語言的立場大相逕庭。傳統的語言觀將語言看作是對世界萬事萬物的「再現」，一種狀物寫意，從而能在人際進行交流的符號象徵，不僅客觀存在的世界，而且包括人主觀意義的世界，都必須通過語言才能再現，這種視語言為客觀世界的真實再現，語言與其所指合一的觀點，後結構主義者與解構主義者曾稱之為「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這種傳統的語言觀到了本世紀，特別是六〇年代以後，出現了重大的轉折，由於對語言本身的興趣，導致了不少學者逐漸對語言是否能如鏡子般反映世界這樣的假定產生了根本的懷疑，亦即我們透過語言對於真實世界的把握是不是一個“幻象”（simulacrum）？語言還能不能忠實無誤的充當人與世界的媒介？這種懷疑有的學者稱之為一種語言的「再現危機」或是「語言學的轉向」（the linguistic turn），用當代哲學家羅蒂（Richard Rorty）的話說，傳統形上學視語言為反映自然的一面鏡子，而「語言學轉向」的一個最基本、也最重要的結果，就是使這面鏡子不可回復的破碎了。換言之，使人們對於作為外部世界「再現」的語言永遠失去了信任（盛寧，1997：41-61）。當語言不能如鏡子般的「再現」世界，則它與世界的關係的主張也發生變化。有的學者主張語言有界定世界、建構世界的功能；有的學者主張語言根本是獨立於世界符號體系；有的學者認為它是一種社會實踐的形式，這些不同的立論都影響到對媒介文本的研究，我們可以統稱為再現的建構途徑，本文稍後的立論，即是建基於這些對語言預設而來。

不過，他者如何被再現？或者說語言怎麼建構他者，不同領域的學者卻有完全不同的立論，目前探討他者如何被建構的理論起碼就有語言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精神分析、文化研究、女性主義、馬克斯主義等不同的立論，深入釐清其不同的理論系譜與方法論的異同非本文所能負載，因而也只能就其某一切片做嘗試性的討

論，由於我們的問題意識主要是探討媒介文本中的他者，因而範圍也就限定在有關媒介的文獻中來討論。在這裡，本論文認為基於對語言如何建構意義的不同立論，選擇探討媒介文本如何再現他者的三條進路，這三條進路都與語言有關，但關懷的焦點則不盡相同。第一種是純粹語言學（linguistics）立場的，認為對他者的再現，基本上涉及的是選擇那些語言結構的要素來建構，而我們揭露這種建構策略的知識活動主要是透過細緻的語言學分析來探討；其次是符號學（semiotics）立場的，認為對他者的再現，所涉及的是一組符號之建構，而揭露這些符號內涵的知識活動主要是透過詮釋來進行的；第三種是後結構主義之社會學或歷史學立場的，認為再現他者的策略，基本上是透過某種特定歷史與權力支配下的論述（discourse）所建構的，而揭露這種論述建構與實踐的知識活動主要是透過對歷史脈絡與權力主體的分析來進行的。

以純粹語言學的立場來探討再現，基本上將關注的焦點集中在語言的形式要素上，認為意義的形成是受到這些語言學要素所制約的，它觸及了種種語言學的分支，如語音學（phonetic）、字形學（graphemic）、字彙學（lexicical）、語法學（syntactic）與語意學（semantic）等學科中有關字、語句與文法等變異對意義形成的影響。基本上這些語言學的分支在不同學者的立論中也有輕重不同的強調，這其中較著名的學者包括Roger Fowler、Teun A. van Dijk、Norman Fairclough、Theo van Leeuwen等，這些學者無例外都是具有語言學背景的，因而他們所提出的分析策略中一定包含對媒體文本中相關語言學諸要素的檢視，只不過不同的學者間所強調的語言學要素並不相同，如R. Fowler就特別著重語法與字彙的選擇；而Teun A. van Dijk就比較重視語言的認知心理與語意的層面，當然不少學者也都致力在分析策略上作更廣泛的整合（如van Dijk與Fairclough等），這些分析策略運用在他者再現的媒體文本中，甚至可以處理到相當細緻的語言要素。

從符號學的立場來探討再現，關懷的焦點集中於意義形成中符號的功能，它追問那些是媒介文本中具有符徵性（signifiers）的符號？這些符號的意義又是什麼，亦即它們符旨（signified）為何？符徵性的符號又如何再現意義？在這裡再現的分析進路從語言學進入了較宏觀的文化領域，符號的意義與建構也取代了語言形式要素的分析。學界透過符號學研究媒介文本代表性學者包括R. Barthes、J. Fiske、J. Hartley等，其中Barthes的神話學分析對他者再現研究的影響最深遠，在這裡他者的再現被理解成符號化的一種迷思或刻板印象，而詮釋此一迷思背後的意義，揭露他者如何被一組符號所塑造，即是符號學者的任務。

不論是語言學亦或是符號學，針對再現的探討基本上都是定基於語言層次，而第

三種探討進路，則不再侷限於從語言的層次討論意義的生產，而是更廣泛的從歷史或社會的脈絡中去搜尋意義如何被生產。在這裡意義的生產被理解成特定期間內知識與權力操作的過程，亦即在追問他者如何再現的課題上，研究者焦點不再固著於語言，而是將佔據發言位置的主體召喚出來，探討其與他者在特定期間的支配或權力關係間為何，並探究其如何形成有關他者的共同知識，這種被生產的知識通常稱為「論述」(discourse)，而他者多半即是透過此一論述的操作而再現(Hall, 1997: 43)。很清楚的，此一理論觀點來自於法國學者M. Foucault對再現的特殊觀點，而不少學者如E. Said、S. Hall等人都是循這個進路探討他者在媒介文本中如何被建構。

必須強調的是，本文對三種進路的劃分固然有向度與層次的不同，但同時也是一種討論上的便利，在實際研究中這三種進路事實上沒有那麼涇渭分明，特別是不少研究策略經常混同不同的途徑進行，再加上不少學者曾致力於文本與脈絡層面的整合(特別如van Dijk、Fairclough等)，這使我們在引介部分學者論點並加以分類時，必須另加註腳說明。不過大體上，本文認為循這三條進路，已能或多或少的勾勒出現行西方相關理論對他者再現研究的大致輪廓。

### 參、語言結構的再現：形式書寫的操縱與選擇

在建構他者的媒介文本中，除了圖像形式外，最常見的還是以言談或文字書寫的形式來再現，在這裡語言顯然成為發揮再現他者的主要功能。書寫語言與再現的關係既然這麼密切，於是就有不少具語言學背景的媒介研究者認為，不同的語言構成要素與形式可以決定社會結構中不同角色在媒介文本中的再現，這些角色當然包括那些被劃歸為他者的角色在內，而透過對語言學(linguistics)要素的分析，可以將這種對他者的誤現(misrepresentation)與歧視(discrimination)揭露出來，這種直接就語言學諸要素與形式加以分析的途徑，有的學者稱之為批判語言學(critical linguistics)或批判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Fairclough, 1995; Fowler, 1991)。此一研究途徑由來自英國與澳洲的批判語言學家先導，其中特別是Roger Fowler與Gunther Kress，再與英國倡議論述分析途徑的Norman Fairclough以及荷蘭文本語言學者van Dijk合流後，在八〇年代甚至九〇年代成為研究媒介文本的重要學派之一。而特別是在探討他者的再現上，此一途徑有其明白的政治議程，它意圖揭露隱藏在社會言談中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呈現不同位置上社會角色的論述生產，以挑戰既有的社會政治支配(Bell & Garrett, 1998: 6)。

在語言學的立場上，此學派主要建基於M. A. K. Halliday的功能語言學派，認為語言與社會結構間存有某種功能上的關係，而再現即是語言相對於社會結構表達意思概念的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在他們看來，所有文本的再現都是透過深染價值色彩的語言所傳遞、塑造的（Fowler, 1991: 32）。它預設了兩個對語言與真實世界關係的基本假設，一個是語言在社會結構的運作中發揮了一定的意識形態功能，其次是主張語言的使用受制於其在社會體系的位置，在這兩個假定下，批判語言學主張語言的文法、字彙等形式要素的使用，實際上是言說者根據不同的社會情境所作的選擇，不同的抉擇自然就呈現不同的意義（Fairclough, 1992: 26），而對文本中涉及人、事、物再現的分析，亦即是對符碼化在語言中的字彙與文法的分析（Fairclough, 1995: 27）。

從批判語言學的觀點言之，他者在媒介文本中被書寫的過程中，勢必包含一連串的選擇過程，這些選擇過程可能包括：何者被包含在內而何者被排斥在外？何者是明示而何者又是暗示？何者是焦點而何者又是背景？何者是主題而何者是副題？那些類目被挑選等等。而在諸般選擇中，首要面對的是存在（presences）或缺席（absences）的抉擇，或者說是在場或不在場的抉擇，這其間主要處理的是誰（who）以及什麼（what）的問題，亦即是所謂誰以及什麼被選擇出現在文本中？誰以及什麼在文本中被刻意刪除，或根本就不存在？在媒介文本中，基於平面媒體空間以及電子媒體時間上的限制，這種抉擇在技術理性上恐怕是必要之惡，例如在一般新聞報導中的歷史脈絡多半都會被優先選擇刪除，亦即建構新聞的標準形式大多是將其組裝成一個事件，並從其先前與後續的事件序列中孤立出來，也等於就是將其從歷史的過程中抽離出來（Fairclough, 1995: 106）。但在涉及他者再現時，這個存在與缺席消失的選擇就複雜了，他者有無在媒介文本中被刪除？如果沒有被刪除，又是以什麼樣的形式再現呢？這是我們能從語言學分析他者再現的起步。

Fairclough曾針對此一存在或缺席的抉擇問題作更細緻的劃分，他將之區分為完全缺席（absent）、預設（presupposed）、背景（background）、核心存在（foreground）四種。這其中所謂「完全缺席」，是完全被刪除而沒有出現，「預設」則同樣未在文本中出現，但卻存有暗示的意義，它大多訴諸閱聽人常識上的假設，或是所謂你知我知不必明言的共識（Fairclough, 1995: 107），Flowerdew認為有效操縱預設（manipulative presupposition）可以喚起我群之主體意識並有效與他者做區隔，並可不經意的將若干原本應為意識形態的論點轉化為不證自明的公設、公理（Flowerdew, 1998: 462）。不論是缺席亦或是預設，在媒介文本的書寫中都是一種

刪除 (exclusion)，在處理他者的再現中，這種刪除的策略是常見的用法，Riggins 就曾指出在不少媒介文中同時提到主流團體與他者時，主流團體的成員多半是有名有姓的被提及或被引述，而他者可能是以類目化的形式現身，既未被指名 (named)，亦未被引述 (quoted) (Riggins, 1997: 12)。更細緻的書寫策略是經常交替使用缺席與預設的用法，譬如有時為了隱匿不利主流團體的報導，而將其導入預設中，有時為了彰顯客觀公正，而將他者置於背景中等 (van Leeuwen, 1996: 38-39)。Fairclough與van Leeuwen都曾指出，那些人或事該現身存在，那些該消失，或納入背景、或隱入預設等，固然是一種當下的選擇，卻也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操作，它與建構者的意圖與利益是分不開的 (van Leeuwen, 1996: 38; Fairclough, 1995: 108)。

如果他者沒有在媒介文本中被刪除，那麼接下來就是角色配置 (roll allocation) 的抉擇了。亦即他者在媒介文本中是怎麼被安排，扮演了何種角色，批判語言學者認為透過語法的操縱，事件參與者之間的角色可以重新配置，彼此間的社會關係也可重新安排 (van Leeuwen, 1996:43)，儘管批判語言學的立論大體上都是從英文語法學的基礎上出發，這些原則不一定能適用到其他的語言體系中，但我們起碼已經可以看出他者在英文語法的脈絡中是怎麼被建構了。在媒介文本文句的分析策略上，Roger Fowler與Norman Fairclough曾分別提出一套類似的語法分析策略 (Fowler, 1991) (Fairclough, 1995)，針對單一文句內的參與者 (participant)、述語 (predicate) 與情境 (circumstance) 三個基本要素所構成的種種組合與變異，以及特定段落內各個文句間的結合與變異，進行語意與語法的分析，這種分析Fowler認為可以揭露其在意識形態上的意涵 (Fowler, 1991: 66-70)。

就單一文句的分析為例，Fairclough認為整個書寫過程其實是包含了一系列的選擇。首先面對的是字彙的選擇，亦即是從何種既定的類目中，挑出代表再現參與者與述語的字彙。在這裡所謂既定的類目，係社會踐履溝通功能，透過語言將一組概念加以對立、互補、包含，乃至對等方式的排比，一旦這種人為的類目化關係被固定化，就成為維持有效溝通、促進社會穩定之必要，形成一種視為當然的共識、法則與秩序，甚至被偽裝成一種自然、抽象的「客觀」 (Fowler, 1991: 54-59)，而涉及到他者再現的字彙選擇，正是隱藏在此一共識中。可以說，他者作為一個角色在語句中如何被指謂 (referred)，經常成為區隔我群與他者的策略，van Leeuwen指出，在同時再現我群與他者時，我群常被指謂為特定的、可指名的個體，而他者則被指謂為普遍化類目；我群是一個擁有共識的集體 (collectivisation)，而他者則是聚散不定的總和體 (aggregation)，可以化做成可理性計算 (rational calculation) 的統計資料



(statistics)；我群是一個有知有識的人格化主體，以專有名詞、第一人稱代名詞或所有格代名詞再現，而他者則經常被非人格化，包括被抽象化、或是被客體化等，如窮人、黑人、伊斯蘭、違法者等 (van Leeuwen, 1996: 46-68)。在相應關係上，我群通常包辦了行為過程中的行為者、意識行為的感受者、言說行為的表達者以及互動行為過程中的行為者等人 (van Leeuwen, 1996: 44)。Fairclough在研究許多涉及他者的媒介文本中，就發現他者經常沒有被直接指涉 (directly refer)，而是將許多他者所涉及的情境與過程加以名詞化 (nominalization)，當情境與過程被轉化為名詞，甚至被建構成事件的參與者時，他者的現身就合法的被刪除了，而有時為了合理化這種名詞化的作用，甚至將其抽離特定的情境，並加以抽象化 (Fairclough, 1995: 110)。

繼字彙的選擇之後，接下來則是過程類型 (process types) 的選擇，亦即是個體參與者所涉入的事件、關係、狀態如何被再現的選擇。這種選擇其實也就是句法類型的選擇，它包括居於主詞位置之行動者及於受詞的行動過程 (基本句型：主詞+動詞+受詞)、行動者涉入因果緣由的事件過程 (基本句型：主詞+動詞)、行動者涉入某種情境的狀態過程 (基本句型：主詞+動詞+補語)、強調參與者意識形態的心靈過程 (如選擇使用類如理解、認知、意圖等知覺動詞) 以及強調參與者口頭言說的口語過程 (如選擇使用表示、說明、宣示等動詞) 等 (Fairclough, 1995: 109-110)。這種針對過程類型的選擇，其意識形態的意涵亦表現在於對參與者的再現上，如果要突出行動者的主動性與因果責任，就選擇行動過程，並將之納為「核心存在」 (foreground) (如導言中的主要句)，如果要淡化行動者的重要性或責任歸屬，就選擇事件或狀態過程，並將之納入背景脈絡中。除了Fairclough所提的過程類型的選擇外，Fowler另外還提出一種語態轉型的選擇，即行動者在主動/被動語態轉化間的選擇，Fowler認為在媒體文本中，這種置換的選擇不僅是語法排序的轉換，還有意識形態上的意涵，例如若選擇主動語態，則居於主詞的行動者，勢必要被課以行動後果的責任，相對的若改為被動語態，則居於主詞的很可能被略去或刪除，後果責任亦會被淡化 (Fowler, 1991: 66-89)。很明顯的，在涉及他者的再現上，前述所提的選擇與轉型就能發揮一定的作用，如刻意選擇事件的狀態的過程、受詞的位置、被動的語態等，相對的涉及我群的報導時，則多半選擇行動的、心靈的與口頭的過程，居主詞的位置與主動語態，只有涉及不利於我群或權威當局的再現時，才會採取類似上述他者再現的方式，以隱匿、淡化甚至刪除其責任。

讓我們選擇若干事例加以探討，在陳述涉及他者的事件上，透過單字

(wording) 與辭彙 (lexicalization) 的選擇，可將他者置入一個經過重建的脈絡中，使之形成某種被扭曲的刻板印象。如Brokes就特別發現英國報紙在報導非洲的戰爭時，幾乎無例外會順便提到部落主義 (tribalism)，結果這兩個字眼就經常緊密的串連在一起，塑造了對非洲負面而落後的印象 (Brokes, 1996: 471)，有時不同辭彙經刻意安排在一起後，甚至可以模糊原有的意義內涵與範圍，而締造出一種全新的意義。Brokes在研究英國衛報新聞中對非洲的建構時，就發現其一再重複引入暴力 / 和平、壓制 / 民主、絕望 / 希望三組概念，透過對和平、民主、希望的強調，而預設非洲的暴力、壓制與絕望的負面意涵，特別在所謂暴力 / 和平的對立上，若干字眼如暴力、死亡、和平談判、殺戮等一再出現，在這些辭彙一再重複、置換下，塑造了一個滿佈兵荒馬亂的非洲意像 (Brokes, 1996: 472-473)。Fowler探討女性在媒介文本中的再現時，就特別發現在辭彙使用上，用在女性上的字眼遠比男性多，這其中有許多是明顯涉及歧視的字眼，如以涉及不貞、淫蕩的特定字眼罵人，以非人性的字眼、寵物、男性的附屬品來形容女性，甚至在處理有關女性精英談話時，都會刻意附加一些情感與美學的辭彙，而類似情況在論述男性上幾乎完全不會出現 (Fowler, 1991: 96-97)。Wodak在研究奧地利媒體報導羅馬尼亞時，更明顯發現不同的辭彙所塑造的不同的脈絡，當羅馬尼亞領袖希奧塞古在1989年年底垮台時，奧地利媒體報導羅國新聞多集中其內部的貧窮、疾病、暴力等字眼，塑造一種亟待外界支援的脈絡，然而到了九〇年代大量羅國難民湧入奧國後，選擇的字眼立即變成帶有敵意意味的字眼如非法移民、人口壓力、混亂等 (Wodak, 1996: 118)。

再以過程類型的選擇為例，Fairclough在分析英國BBC電台於1984年所錄製的非洲孟加拉貧窮問題時，就發現這篇涉及窮人事件與情境的報導，在文字表達上幾乎完全不直接指涉窮人本身，反倒是若干與窮人相關的狀態與過程，如危機、貧窮、不平等、飢餓、暴力、內部衝突等，都被名詞化 (nominalization)，在文句中取而代之擔任參與者，而真正應該作為主要參與者的窮人本身卻被刪除。同時Fairclough也發現，就算窮人被直接指謂，他們也不會被安排在居主詞位置的行動者 (actor)，而多半是受他人行動影響、支配的受詞，或僅是某一狀態過程中的參與者，在語態上多半也被選擇以被動的形式。就算有時勉強安排成行動者，也可能被納入背景脈絡中 (Fairclough, 1995: 112)。又例如Tony Trew在研究1979年南非報紙對黑人抗議報導，曾發現這樣的標題「抗議的黑人被警方射殺」 (Rioting Blacks Shot Dead By Police As ANC Leaders Meet) 在這裡，採取被動的語法，使得黑人的行動看起來遠比警方的行動突出，特別是將「抗議的黑人」 (Rioting Blacks) 安置在標題語句的

首位，無形中降低了警方過當行動的後果，如果標題改為「警方射殺黑人」(Police Shoots Blacks)就可能清楚點出誰該為動亂負責，該標題先用「抗議」(Rioting)的動名詞修飾黑人，再將其置入被動語法中，使得此一標題很清楚地暗示誰才是造成動亂的禍首(Mills, Sara, 1997: 148)。

就文句間的組合、序列之變異而論，學者也曾提不少分析的策略，例如van Leeuwen就主張，可以針對報導內容中的文句係聲明本身(speech itself)，針對聲明的回應(reaction)，或是針對聲明的評估(evaluation)三者的頻率分配加以分析或組合，每一部分又可區分為是直接引述(direct quotation)、要點簡述(summarize)還是細節闡述(formulation)，透過其間組合的不同，van Leeuwen稱其為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ation)的再現。例如針對一則爭議性的新聞，其文句的組合方式是以聲明為主抑或是以評價為主，回應的部分又占多少比例，這其間有多少是直接引述，有多少是要點簡述等，都會形成不同的再現。而文句的序列，van Leeuwen則認為可檢視其將聲明、回應與評估是安排在主題抑或是背景，所謂主題多置於標題、或是導言以及各段落中的主要句(main clauses)，而背景部分則是安排段落中其他的附屬句(subordinate clause)，在探究文句間關係的再現上，這種序列的分析，提示分析者不僅要留意什麼被再現，而且還要關注這些被再現元素間的相對比重與重要性(Fairclough, 1995: 117-121)。Fairclough曾透過此一分析策略比較英國BBC與每日鏡報這兩個媒體在1992年10月對工黨領袖Tebbit批評首相的梅爾簽署馬斯垂克條約的新聞，他發現在文句的組合上，BBC幾乎全集中Tebbit發言的要點簡述並搭配梅爾內閣的一個回應，而相對每日鏡報則完全集中在對Tibbet發言的政治後果評估，亦即文句的組合完全係針對聲明的評估，Tibbet本身的發言則完全被忽略(Fairclough, 1995: 117-120)。

除了van Leeuwen所提示的分析策略外，Fairclough與van Dijk也以分別提示可以循文句段落的部分一貫性(local coherence)來分析文句間組合與序列的變異，但他們兩人的著重點並不相同。Fairclough較強調文句間語法上的連結，而van Dijk則強調其語意上的意義連貫。Fairclough認為文句間的關係大致可以區分幾個模式，一種是文句間的經營(elaboration)關係，即某一文句可透過重述(rewording)、例證(exemplifying)或澄清(clarifying)來描述或突出另一文句。其次一種是延伸(extension)的關係，即文句間透過直接附加(以「與」、「以及」或「再者」作標示)，正反對立(以「不過」、「但是」或「然而」作標示)或變異(以「或者」、「另外」等作標示)的連結來延伸其意義。再一種則是促進(enhancement)的關

係，即文句間透過時空、因果、條件的修飾來促進其焦點（Fairclough, 1995: 121），透過此一分析策略，Fairclough曾分析英國BBC製播的「綠色革命？」中的幾個段落文本，如其中有一個段落是「所有第三世界的農村生活都愈來愈困頓……於是窮人湧向都市，都市的窮人更加窮困」，另一個段落則是「當米價上漲，飢餓與不滿亦滋長。在城市中，一般人尚能各安其位」，Fairclough認為第一個段落的部分一貫性，主要是後兩個句子經營第一句，形成一種暗示性的因果關係，即「窮人湧向都市是因農村生活日漸困頓」；而第二個段落則是後面兩個句子對立延伸前面兩個句子，即「儘管飢餓與不滿滋生，但城市居民尚能各安其位」（Fairclough, 1995: 123）。

van Dijk的論述語意學（discourse semantics）或文本語意學（text semantics）（van Dijk, 1991, 1995: 243-289），則主張透過個別子句間意義連貫（local coherence），或是一連串命題相互扣連的意義連貫（global coherence），可以檢視特定媒體文本建構之意涵（implications）。以他者的再現為例，van Dijk認為在媒介文本中若某一社會團體一再被描述對某些負面行動（如犯罪或暴力）存有時間、條件、原因或次序上的相關，不論其是直接或間接、明示或暗示，此一社會團體已經很難擺脫負面意涵了；相反地的某些主流團體即便從事負面行為，都可以類似的手法將之卸責。例如美國紐約時報1993年4月7日一則報導如下：「在恐怖份子一再以伊斯蘭正教組織的名義攻擊觀光客、警察與教堂之後，開羅官方被迫以武力反應」，在這段報導中，恐怖份子（terrorists）攻擊（attacking）觀光客、警察與教堂的行為被型構（frame）成一條件子句或片語，修飾主要句「開羅官方被迫武力反應」，而其國家所施之暴力被描繪成「被迫」（obliged）、「反應」（respond），其行動之採取是被迫而不可避免的，因而暗示任何後果亦是不必負責的（van Dijk, 1995: 261-262）；這種負面的描繪van Dijk認為有時不是說得太少，而提扯進太多不相關的事物，特別是涉及他者的報導。如在犯罪新聞中，不經意的貼上一些不相干的種族標籤，這種不相關的扣連所塑造的聯想是不可能產生正面意涵的（van Dijk, 1991）。

對批判語言學或論述語意學的研究者而言，解讀媒介對他者再現的策略基本上是一個語言學的活動，他們肯定語言活動背後意識形態支配的作用，但他們的分析進路無例外都是從語言本身的要素著手，如語句、字彙、語意等，而他者的再現，對他們而言就是對一組字句有意的選擇，所扣連出的意義。此一分析進路從提出後也一直面臨若干質疑，最主要的質疑是語法結構、字彙選擇與社會意義之間究竟是否存有一對一的機械對應關係，不無疑問，倘若其間的關係確實是直接而透明的，則再追究文本意義的詮釋與生產過程就顯得是多餘了，但事實上文本的意義不可能固定的附著在特

定的社會結構上，它是有變異可能的。此外，在分析焦點上，除了文法、字彙外，論證形式、敘事結構等都可能攜帶意識形態的意涵，這一點透過其他閱讀的策略，可以很清楚的呈現（Fairclough, 1992: 28-29）。

#### 肆、符號再現的策略：從形象符碼到迷思的建構

在媒介文本中，為何有些社會角色很容易被辨識出為他者？而代表這些被再現為他者的意像（images）縱然包含多重的意義，但總是有某些負面意義必定居優勢位置，成為偏好性意義（preferred meaning），要追問這種帶有負面偏好意義究竟如何形成，顯然不是語言本身的要素所能解答，而必須要從更廣泛的文化脈絡來理解；換言之，他者之被建構，不僅是一個語言過程，也是一個文化過程，語言提供了一組符號，文化提供了一系列的意義，他者被符號化的同時，也攜帶了特定的意義，而從文化脈絡去探究他者如何被建構的，即是符號學家的任務。

在語言學的立場上，符號學主要建基於索緒爾（Saussure）的結構語言學，主張語言係傳達觀念的符號體系。符號又可分為符徵（signifier）與符旨（signified）兩個部分。符徵指的是符號形式本身，或是文字的語音部分，而符旨則是文字所指稱的意義（meaning），符徵與符旨間是一種人為的、武斷的再現關係，亦即符旨做為一種固定的「概念」或「展現」（presence），使得符徵有「再現」符旨的可能。而一組能夠傳遞社會意義的符號系統，則稱之為符碼（如交通號誌），索緒爾認為符碼的組成，係透過從系譜軸（paradigms）的選擇（selection）以及毗鄰軸（syntagms）的組織（combination）所組合而成。在這裡系譜軸係指被選用符號所從出的一組符號，而毗鄰軸則是指被選用符號所組成的訊息。例如若以英文單字作為一個符號，則字母就是系譜軸，而組成的英文字就是毗鄰軸，若以英文單句視為符號系統，則組成句子的單字就是系譜軸，整個句子是就是毗鄰軸（Fiske, 1990:56-58）。在他者的再現上，分析他者如何被一組符碼所描述乃至解讀其內在的意義是同等重要的。因而符號學家也提示了兩個探索他者再現的途徑，一是透過對描述他者的文本進行符碼分析，一是解讀這組符碼背後的迷思運作，前者著重符徵的分析，後者則著重符旨的解讀。

如前所述，一組描述他者的符碼，其符號組成的方式包括縱向的系譜軸分析（paradigmatic analysis）與橫向的毗鄰軸分析（syntagmatic analysis）。系譜軸分析主要是檢視符徵的選擇，它有點類似批判語言學分析中的字彙分析，但後者著重語

意，系譜軸分析則較著重符徵間的差異，例如一則伊斯蘭地下組織所策動的爆破案，選擇「恐怖主義者」抑或是「解放戰士」就攜帶完全不同的意義。而某一角色被歸類為他者，關鍵就在系譜軸上的符徵選擇，解讀這種選擇往往可透過幾組「二元對立」來尋找媒體文本中隱藏的對立模式，特別是在涉及界定他者或書寫他者的特質、行動上，這種「二元對立」的發現，特別具有意義（Berger, 1995: 96-97, 1992: 28-29）。在媒體文本中可以循抽象到具體尋找多組的二元對立，如和平／戰爭、文化／自然、文明／野蠻、教育／無知、白人／有色人種、男人／女人、法律／秩序等，這種尋找「二元對立」的系譜軸分析，特別在涉及到他者的再現時，往往可以發現其社會共識後的價值與歸屬，Steve Chiball曾羅列一系列這種社會共識與矛盾的二元對立，如合法／非法、溫和／極端、妥協／教條、秩序／混亂、合作／對立、容忍／暴力、建設／破壞、清廉／腐敗、理性／非理性、公正／偏見、務實／意識形態等（Fowler, 1991: 51-52）。至於毗鄰軸的分析，則主要是檢視不同符徵間組合的方式，亦即在媒體文本中，一組符號是如何被安排、組合的，解讀這種組合大體可循論證（argument）或敘事（narrative）的分析（Tolson, 1966: 26-43），論證分析主要係檢視一組命題中對證據、理由（justification）的安排，在涉及他者的再現上，經常透過特定證據的安排，或是將責任、罪行的配置排比如「為他們好」來合理化對加諸在他者的若干措施等；而敘事分析則是要從文本中尋找故事情節的規律、背景、過程、角色互動、結局安排等，如John Hartley在分析美國與他國衝突的新聞敘事結構時，曾指出其相當類似於某些電視影集的敘事結構（如警匪片），例如在報導美伊朗人質衝突或伊拉克戰爭時，美國總統卡特、布希往往都以英雄人物出現，而伊朗的柯梅尼或伊拉克的海珊則以反派人物出現。在敘事情節發展上通常是美國或內部的社群遭逢邪惡勢力威脅，正式體制無從解決此一威脅，因而一個無私的英雄就適時出現解除了危機，在解除危機的過程中相當強調待解決的難題、待尋覓的因果關連、待征服的障礙等，在涉及與他者對立的再現上，這種情節經常再現於新聞文本中（Harley, 1982: 116-117）。以1985年12月31日英國太陽報就1984年到1985年的煤礦工人大罷工收場後的一則報導為例：「英國煤礦工業出現了奇蹟。礦工以較少的人力生產更多煤礦，也賺得更多的所得，人們已能理解他們工作愈辛勞，他們賺得也愈多，同時這也意味將會有一個愉快的聖誕節，以及一個能償還因罷工所拖欠債物的機會」，這則報導涉及一系列二元對立價值系譜軸的選擇，如辛勤工作、合作、物質報償等，而在毗鄰軸的安排上，罷工與債物並列在一起，成為新聞背景，而辛勤工作、賺取利潤則與工業奇蹟則被排列成一論證的組合，成為新聞焦點（Fowler, 1991: 50）。

在媒介文本中，符號學家認為再現不僅是符徵與符旨以及所指涉物間的簡單關係，在文化脈絡上，這種再現可能以更廣泛的邏聚組合（configurations）形態存在，法國的符號學者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指出加掛在符徵上的符旨，除了直接意指外在事物的明示義（denotation）外，還有深嵌在文化價值體系中的隱含義（connotation），或稱第二層次的符旨，透過這種意義層次的解析，巴特針對媒體文本的再現提出另一個重要概念—迷思（myth）—亦即當一組符號與隱含義塑造成一個特定訊息（message），並成為流行的社會意像，它就成為一種迷思（Bignell, 1997: 16）。例如勞斯萊斯（Rolls-Royce）作為一個符徵，不僅指謂一種名牌汽車，它還包含一組更廣泛的隱含義，如財富、奢侈等，這組隱含義與符號就共同形成一種象徵財富的迷思，對巴特而言，迷思是一種文化思考事物的方式，一種概念化事物、理解事物的方式。它的主要運作方式是將歷史「自然化」，亦即主張迷思所呈現的意義是自然形成的，而非歷史或社會情境下的產物。而一旦迷思被自然化、神秘化，它的相關政治與社會意義就被隱匿了（Fiske, 1990: 87-92）。這種對「歷史」自然化的運作方式可以立即關聯到對他者的再現上，亦即在不同文化脈絡中，種種對他者的迷思其實都掩飾了它的歷史起源，造成其意義看來都像是「自然」的一部分，可以放諸四海皆準。

John Hartly曾舉1980年12月28日每日鏡報的頭版的新聞為例加以說明，該報針對年度風雲人物作一次民調，結果由一位女藝人Anna Ford奪魁，於是該報頭版除了配一幅Anna的照片外，標題為「性感安娜民調居首」（Sexy Anna Tops Poll），導言則為「可愛的安娜今天贏得她從未想過的頭銜—1980年的性感象徵」，Hartly認為，在這則新聞的符號再現中，其符旨並不僅是一個特定事例，而是數個迷思的連結，首先是影藝迷思（showbiz myth），由演藝人員的高知名度與魅力所塑造的新聞性，其次是女性性感的迷思（myth of female sexuality），即透過她身體性徵以及她對男人的吸引力來界定，如性感安娜（sexy Anna）、「可愛安娜」（lovely Anna）等符徵的選擇等等，Anna本人顯然並不樂於接受此一頭銜，報導中引述她對女人為何因外表如何而被議論的不滿，但Hartly認為，作為一個性感迷思的符旨，Anna或許可以持異議，卻無法扭轉這些迷思運作（Hartley, 1982: 28）。

以族群他者的再現為例，Christopher P. Campbell研究美國主流媒體對黑人意像的建構，發現依歷史的先後曾經出現三種主要的迷思。最早的是「邊際的迷思」（myth of marginality），簡單的說就是黑人在媒介文本中幾乎是視而未見，他們被排除在主流社會外，幾乎不被主流媒體關注，他們的存在也許沒有被忽略，但任何涉

及他的再現都缺乏任何觀點與深度 (Campbell, 1995:142)。如同John Hartly所謂，將黑人邊際化的思維方式，等於就是視黑人為無關聯的 (irrelevant) 與邊陲的 (peripheral)，甚至可以進一步視為對主流社會有破壞甚至威脅的，它會成為迷思是它神奇般解決了對邊際的歧義，那些發生在邊際的人與事不僅可以被忽略，甚至可以視為根本不存在 (Hartly, 1984: 12)；接下來是差異的迷思 (myth of difference)，此迷思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主導美國媒體對黑人形象的再現，它包含正面與負面兩組隱含義，負面的隱含義是將黑人再現為兼具黑奴與野蠻人兩種矛盾特質的他者，黑奴 (sambo) 包含了懶惰、樂天、笨拙、無知的意涵，而野蠻人則包含了性慾旺盛、危險與衝動等意涵，這種負面的隱含義，Campbell認為經常會影響到美國主流媒體對犯罪新聞的報導 (Campbell, 1995: 62)。而正面隱含義則是將黑人再現為天賦異稟的演藝人員或運動員，這也是黑人在媒介文本中唯一得以被頻繁並正面報導的意像，此一迷思同時也呼應了多元社會的假象，但另一方面它也隱匿了在舞台或運動場的幕後，經紀人與教練大多是白人的現實，這中間所隱藏不能明說的隱含義是黑人運動員或演藝人員固然有運動或表演的天份與能力，卻沒有領導與指揮的能力 (Campbell, 1995: 63)；最晚近的則是同化的迷思 (myth of assimilation)，也可稱之為啓蒙式的種族主義 ("enlightened" racism)，它關連到一個更古老的美國夢迷思，即美國是個民族大熔爐，這種神話承認黑人在教育、政治、經濟與社會上的弱勢，但卻在主張現今社會對他們的歧視與偏見已經不存在，黑人可以有平等的競爭機會，依自己的努力進入美國主流社會，有限的成功案例可能一再被強調 (如電視劇寇斯比劇場 [Cosby Show] 所顯示) (Campbell, 1995: 87-112)。

再以性別關係為例，Myra MacDonald曾在其所著「再現女性」一書中提出以男性為中心的媒體在本世紀所塑造的四個主要關係女性意像的迷思。第一個迷思是「女性是神秘不可測而善變的」 (enigma variations)，在這個迷思下，女性的意像被填充了兩種狀似矛盾的男性想像，即不是完美無瑕的女神就是能吞噬男性的怪物，女性在這種神話下被迫抽離其歷史與社會的脈絡，而被神秘不可測、謎樣甚至致命的意像所取代 (MacDonald, 1995: 105-131)；第二種迷思是「女性都是有母愛天性的」，在這個迷思下，所有女性被認定有照顧他人的天性，對家庭、子女無私的奉獻等 (MacDonald, 1995: 132-162)，而女性生育的本能也被用來自然化她們養育或持家的特質 (Fiske, 1995: 121)；第三種迷思是「女性擁有亦享有自主的性慾」，此迷思呼應本世紀女性主義興起，推翻傳統「只有壞女孩才有性慾」以及「用處女貞操交換好男人」的迷思，強調婦女應享有自主的性慾，然而這種帶有解放婦女束縛的迷思，很



快地就被商品化，成爲一種被消費的神話，主流媒體將此一迷思中的政治成分去除，保留了慾望的部分，將之轉化成爲一種個人生活享樂風格的符號，也構築成另一種再現女性的迷思；第四種是有關理想女體的神話，在這種迷思下，女性的身體，特別是西方的、白種的、年輕的、苗條的女體，成爲一種美學的對象，女性透過飲食節制、瘦身運動等實踐來規範身體、重塑身體來符合此一迷思，並同時更廣泛的與流行的衣著、髮型、化裝等符號結合，而女性相關的媒體，特別是女性雜誌，則更透過此一迷思來塑造意義與打造認同（MacDonald, 1995）。

除了族群與性別外，彌漫在媒介文本中有關他者的迷思還有很多，例如John Fiske就指出英國保守主流媒體對工會的主控迷思是破壞的、好爭鬥的、與廣大善良百姓敵對的、而且是反組織的（Fiske, 1990: 129）；又如David Spurn也指出西方媒體對第三世界報導的主控迷思，經常是落後的、原始的、野蠻的、以及待啓蒙的（Spurn, 1994），這些涉及種族、性別、國別以及階級類目下種種對他者的迷思，透過媒介文本的再現，使得歷史充分被自然化（*naturalizing history*），在這裡黑人被邊際化不是起自社會剝削、勞工的罷工不是起自勞資的利益衝突、女性的持家不是出自社會經濟結構的分工、第三世界原住民被原始化不是出自殖民者的剝削，換言之，所有他者之所以成爲他者，都與居優勢地位的主流團體無關，而是這些「他者」的本性使然，而代表法律、秩序、社會、文明的我群亦相對被賦予正當性的位置，如此一來被抽離歷史、結構脈絡的他者成爲迷思亦不足爲奇了。

對符號學家而言，媒介對他者再現的策略即是將他者符號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他者符碼包含對一組特定符號的選擇與組合，這些符碼並與隱含義扣連，形成某種流行一時的迷思，不論是符碼或是迷思，它都彌漫在文化環境中，以符號或一組符號扣連的形式再現，而符號學家的任務之一，即是透過詮釋將其符碼與隱含義揭露出來。相較於針對語言學要素的分析，符號學的進路突出了對文本內涵意義的詮釋，但符號學與批判語言學一樣，將再現的解讀限定在一封閉而靜態的語言體系中，而符號學進路又特別著重相對於符旨的符徵（*signifier*），一切文本皆化約到需要解碼（*decode*）的符號，忽略了符號使用背後可能存在的權力運作脈絡，同時，符號學進路也缺乏歷時的（*diachronic*）或過程的意識，從而也忽略了符號在不同歷史脈絡中的可能變異（Dant, 1991: 115）。

## 伍、論述再現的策略：支配關係的鞏固與顛覆

在媒介文中，相對於我群，他者之被建構、被發明，除了是一個語言過程、文化過程之外，它還是一個實踐的過程。對部分媒介研究者而言，探究他者之再現，不僅是分析語言的要素，或是詮釋符號的意義，還要揭露再現背後的權力關係，這種權力關係包含了某種支配與反支配的運作。而既然談到權力關係，被語言學乃至符號學所忽略的權力主體，或是所謂的發言位置，也被重新喚起納入討論，亦即他者之所以成為他者，在於其是特定主體間權力關係的運作所生產出來的，他者被再現的同時，事實上也再現了這種權力關係的實踐。在這裡我們進入一個解讀他者再現的另一條進路。

明顯的，此一進路對語言的立場與先前的符號學立場有明顯的不同，語言表述不再被視為一組攜帶意義系統的符號組合，而被視為由各種勢力交鋒爭執之後的一種體現，這種體現被稱為「論述」；為這種進路提供立論基礎的主要是法國社會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對福柯而言，再現的問題不僅是意義的探索與詮釋，而且還是透過論述所進行的一種知識生產。亦即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人們如何透過文化理解自我與他者，如何生產社會共同認定的意義，相較之於符號學家，福柯顯然更重視特定的歷史與社會情境對語言的作用（Hall, 1997: 43）。循著此一進路，所謂他者之再現，即是透過他者論述所生產的知識與意義，在這裡所謂他者的論述係指在特定歷史情境下所有涉及他者意義建構與行為實踐的一組陳述。而大致上，這組陳述所包含的內容，包括涉及他者的相關知識、討論他者的特定方式與規則、賦予他者的特徵、處置與規約他者的制度機制、甚至包括追問他者的知識如何被權威化成一種真理、或是否在隨後的歷史進程被新的他者論述所取代等。在此一探討進路中，不難發現相對於語言學與符號學的進路，透過論述所再現的他者，是被限定在特定時空下對所有涉及他者的命名、分類、描述、解釋、發展與判斷等之陳述（Hall, 1997: 45-46）。

他者既然是論述實踐的產物，則所謂他者的再現，亦包含了對他者的再現實踐操作（representational practices），亦即是所謂「差異的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difference）是怎麼產生出來的，在這裡Stuart Hall提示了這種實踐策略，他認為我們在生活世界中一直在將人歸類，但在這些無數類目化的過程中，一部分人卻被劃歸為與我群存有差異的他者。這種他者化的過程包含若干同時的進程，我們可稱之為標籤化（labeling），或是所謂的刻板印象化（stereotyping）的過程，亦即所謂區分出

種種差異的過程，這些區分差異的類目當然是源自既有的文化脈絡。在西方文化脈絡中，經常被主流媒體用來區分差異的類目大致上包括階級、性別、年齡、國別、種族、語言團體、性偏好等，這些類目明示或暗示的將人群分為中產階級／勞動階級、男性／女性、成年／老年／青少年、本國人／外國人、主流族群／少數族群、國語團體／方言團體、異性戀者／同性戀者等，當然類目可能不只上述這些，在非西方社會中，我們還可找出更多區分群體的類目，但僅就上述分類而論，已經是被標籤化或刻板印象化的初階，如同Stuart Hall所謂，這種對人的分類方式當然不能視作為是中立的（Hall, 1997: 235），又因為這些類目中的一部分人又恰好支配再現各類角色的媒介機制，於是被歸在類目另一邊的人就沒有選擇的成為「他者」了。

在將一部分人類目化、標籤化為他者的同時，刻板印象化的再現操作也開始了，操作方式是將這些類目化約成若干簡化的、本質上的特徵，並將其放大且固定下來，如同Hall所謂，透過刻板化印象，個體之間的某些差異被化約（reduces）、本質化（essentializes）、自然化（naturalizes）與固定化（fixes）（Hall, 1997: 258）。而這些差異被突出的同時，也預設了正常與異常、主與從、可接受與不可接受的區分，一旦這種二元化對立形成，就被約定成俗而不易改變。而為避免異例的干擾，任何破壞這種類目穩定的因素都要排除。換言之，這種刻板印象化的操作也同時是封閉而排他的，所有無法歸類的，或是介於二元對立之間的都會被刻意忽略或排除。而一旦這種刻板印象化的操作被固定下來，媒體再現時就可自然而輕易的將特定個體加以類目標籤化（category labels），就如同簡化的邏輯三段論一樣，某一特定個體被歸類於某一種人，也就同時預設他擁有那些簡化、本質化的特徵。而有時為了突出甚至強化他者的差異性，儘管已有類目化的人為區隔，還會另外輔助以命名的策略，不僅將已經劃歸為他者的群體進一步污名化（stigmatized），更有助於刻板印象化的強化。例如Mehan在研究美國加州各階層就規範非法移民的一八七號提案進行辯論時，支持與反對的兩方就各自運用不同的名稱來指稱非法移民，反對實施一八七號提案者將非法移民指稱為「非本地工人」、「未登錄的工人」等，而支持該法案立法者則直接稱呼其為「非法移民」、「非法外來者」，他者在這兩種命名策略下，所攜帶的意義完全不同（Mehan, 1997: 257）。

他者論述除了再現涉及他者的特定知識與意義外，也再現了生產此一知識的權力關係。在這生產知識與權力的相關聯，不僅是對何謂「真理」作權威性的假定，而是可以透過權力促使某些假定成為「真理」。換言之，在特定時空下生產他者的知識，並非在真空中運作而成，而是在特定歷史脈絡與制度機制下，透過特定應用技術與策

略操縱所運作而成。因而要探究他者之再現，就必須同時探究有關他者的概念如何透過論述與權力（或是知識與權力）加以生產、對我群與他者會造成何種後果、並如何在特定歷史脈絡中成爲一種制度化的機制等（Hall, 1997: 49）。不過在這裡權力關係並非限定在由上而下的垂直支配關係，對福柯而言，權力關係是循環的，它從不集中在同一點上，而是一種壓制與反壓制、支配與反支配、收編與排擠、中心與邊緣置換的循環；換言之，權力關係不僅是一種壓制性的控制，它同時也是一種生產，包括生產新的權力關係、新的他者等（Foucault, 1980）。

他者的再現既然涉及了權力的關係，也涉及我群認同的建立，那麼進一步就是召喚「主體」（subject）了，亦即是所謂追問支配的他者論述形構的「發言位置」。對福柯而言，論述生產知識與意義的同時，也同時生產了主體，此主體不能自外於知識與權力，他與論述及再現存於特定歷史脈絡中。由此看來，透過論述再現他者的同時，也同時再現了居發言位置的主體，就如同專供男性閱讀的女體攝影，作品的對象全爲女性，亦即在這裡女性作爲他者被再現，也同時再現了居主體位置的男性攝影師、出版商與讀者（Hall, 1997: 55-56）。可以說，透過對發言位置的占有，鞏固了我群與他者成對立，也鞏固了權力本身。

將福柯觀點進一步用在他者再現討論上的是巴勒斯坦籍學者薩伊德（Edward W. Said）。他的「東方學」（Orientalism）一書正是探討隨著十六世紀歐洲資本主義對外擴張以降，作爲大寫他者（the other）的東方如何被創造、發明的過程。在這裡東方學是一組表達東方和再現東方文化與意識形態的論述，一種西方統治、重新建構與支配東方的文本。透過論述的檢視，可以理解歐洲文化是怎樣自啓蒙運動以後一直有系統的自政治、社會、軍事、意識形態、科學和想像上來支配與生產東方學。在這裡東方是作爲西方的形象、思維特徵和生活經驗的對立而存在，包括熟悉／陌生、西方／東方、歐洲／中東、我們／他們等，他們是被觀察者、被命名者與被界定者。對薩伊德而言，東方論述中所再現的東方與現實存在的東方沒有多大關聯，而是一整套將東方帶進西方教育、意識形態與帝國主義權力的表達方式，同樣的東方被再現的同時，也再現了西方文化主體與權力關係（Said, 1979）。

藉著這種對東方論述的討論，薩伊德將它關聯到西方媒體對有關「伊斯蘭世界」再現的討論上。他在1981年出版的「覆蓋伊斯蘭—媒體與專家如何決定我們觀看其餘的世界」一書中，延續他「東方學」的基本立場，討論美國媒體再現下的伊斯蘭世界。在薩伊德看來，「伊斯蘭」（Islam）與「東方」一樣，都是西方世界創造、發明出來的，在西方媒體中，它很多時候是與恐怖主義、基本教義主義、邪惡、野蠻等

負面概念聯繫在一起的；換言之，薩伊德認為伊斯蘭在美國媒介文本中的意涵有絕大部分是虛構想像（fiction）、部分是意識形態標籤（ideological label），只有很少一部分涉及宗教的意義，當然更與地跨歐、亞、非三洲、人口逾八億以上，國家、社會、文化與地理等都具有高度歧異性的伊斯蘭無關。而美國媒體這種對伊斯蘭近乎巴布洛夫（Pavlovian）式的負面制約反應，薩伊德認為是深植於自中世紀以降基督教世界對抗伊斯蘭擴張的歷史與文化記憶。早在中世紀的歐洲，伊斯蘭就被認定是冒瀆上帝的異端，再加上隨後數百年間伊斯蘭世界與歐洲持續的衝突與對抗，使得歐洲一直存有遭伊斯蘭統治的恐懼。此一歷史記憶到本世紀又添加了新的內容，包括烽火連天的中東戰爭、石油輸出組織（OPEC）所發動的石油禁運、恐怖主義活動、基本教義什葉派的興起等，特別是1979年伊朗美國大使館遭劫持的人質事件等，這些存在於伊斯蘭與西方世界間的政治、經濟、宗教與戰略的衝突，進一步深化彼此的對立，在此一歷史脈絡下，西方的官方、學界發展出一種針對伊斯蘭的論述，透過此一論述，再現了媒介文本中的伊斯蘭，一個敵對的他者（Said, 1997）。

透過論述再現的討論，事實上也部分解答了前一節中若干針對族群或性別迷思的歷史起源。例如在族群關係上，Mercer與Julien在探索黑人男性為何在媒介中經常被刻板印象化時，認為其與長達數世紀白人的殖民史以及黑人的奴隸史脫不了關係。亦即在黑人被迫充當奴隸時，其相對於白人男性的父權權威、家庭責任與財產權都被剝奪或去除，結果黑人男性被「幼稚化」（infantilization），其男性特質只剩下孔武有力的體魄與強烈的性慾，這種論述支配了黑人的再現，不論是運動場上表現卓越的選手，還是對白人文明造成威脅的罪犯等（Hall, 1997: 262-263）。同樣的在性別關係上，女性在媒介文本中被刻板印象化，還不完全是媒介組織受男性支配那麼簡單，以「母愛迷思」為例，基本上是深植於自工業革命以來社會變遷過程中，「公/私」領域的劃分，特別是核心家庭的興起，女人必須留在家裡，而關涉私領域的特質，包括養育、理家、敏感、和被保護的需要等都被劃入私領域，相對於男人則掌握公領域的政治與社會權力。這些深植於歷史的兩性權力關係，支配了早期媒體對兩性關係的再現（MacDonald, 1995: 47-48）。

誠如前述所謂，順著福柯的理路，他者在媒介中再現所涉及權力關係並不會是垂直支配，也不是固定不變的，論述、知識與權力之間呈現的其實是一種動態的關係，它可能透過知識與權力的運作，進一步生產支配論述，同樣也可生產反支配的論述，進而逆轉知識與權力的關係，這亦是為何福柯探討再現時一再強調歷史脈絡的原因，當然媒介再現的政治性格也在這一覽無遺。例如透過女性主義者在知識與權力空間所

佔據的發言位置，針對女性特質與兩性關係所提出另類論述，就包含了尋求顛覆既有性別支配關係的實踐意圖；同樣的若干後殖民（post-colonial）主義理論者所發展出的「少數論述」（minority discourse），重新建構少數民族、被邊緣化族群的發言位置，向主流媒體所塑造發明的刻板印象、迷思甚至論述挑戰。事實上，許多女性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理論者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將被客體化的他者重新加以界定，召喚其主體，建立新的論述，進一步逆轉他者在知識與權力間被支配的位置。而針對他者在媒介文本中的再現所進行的批判，即是其實踐過程中的一部分。

## 陸、結語：再現的政治

顯然的，針對媒介文本中他者的再現，我們揭示了多重解讀的可能性，現在回頭再來看看本論文在一開始，所列舉的若干新聞報導導言，所涉及的若干角色再現的問題。我們綜合上述討論的理論進路，分別簡單的檢視這些導言。

範例一與範例二純粹是用做對比的兩則導言，它揭示同樣是「大陸人渡船到台灣」的敘事。在1985與1994年所呈現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媒介再現。範例一明白交待了主詞的姓名施小寧與張木珠，所連接的相關辭彙包括投奔、自由祖國、復興基地、自由人等；範例二的主詞則是較非人格化的「大陸偷渡客鄭大成等四名」，相關辭彙包括偷渡、打工、查獲、供稱、藏匿、移送法辦、非法入境收留中心等，這兩組角色配置與辭彙的鮮明對比，呈現了台灣媒體對駕船來台的大陸人的「他者化」（othering）的過程。從原先被符號化的「同胞」、「反共義士」到後來的「偷渡客」、「違法入境」者，它其實也再現了冷戰時期海峽兩岸的國共兩黨為尋求統一所進行對抗，以及後冷戰世紀中台灣為尋求自外於中共的不同政治論述，前者揭示一種對「我群」的召喚，而後者則是呈現對「他者」的排斥與畏懼。

範例三則揭示媒介對外籍勞工，特別是對女性勞工的再現。在這則導言中，同時呈現了國族、階級與性別等多重二元對立的支配關係。外籍勞工、外籍婦女在這成爲一個同質化的類目直接納入角色配置中，其間可能存有的歷史或社會歧異全被抽離或刪除，其與台灣男人結婚的行爲被形構成「爲合法長期在台打工」的手段，另一方面，它也強化了對我群社會「民生富裕、人民生活水準提高、賺錢容易」的認同，也透過對「人口品質、人口壓力、文化結構造成不良影響」的焦慮，預設了這些外籍婦女勞工文化落後、對主流社會文明造成威脅的刻板印象。換言之，透過這種對異質文化入侵的迷思，異國通婚被上網到與人口、社會與文化的層次並置。當然，此則導言

的論述型構，也揭露了台灣在八〇年代以後，經濟轉型過程中對外籍廉價勞工需求的歷史脈絡，到了九〇年代，部分外籍勞工藉通婚滲入台灣社會後，外籍勞工就逐漸從純經濟的論述，轉成社會、政治的論述了。

範例四涉及了原住民少女的再現。這則明顯是少女遭人口販子販賣從娼的新聞導言，卻被編組成一種純粹交易的新聞敘事，有關色情工業、人口販賣、山地原住民經濟破產等脈絡完全被抽離，相反地，針對原住民少女的「身體」迷思卻被誇大，導言中刻意加上與報導主旨不相干的「觀念差異、天生條件」等污名化標籤，原住民少女被隱喻成交易的「貨色」，而那些未被標榜為漢人的人口販子，卻被符號化為「求才」的「識途老馬」。更嚴重的是，原住民少女之淪落風塵，在這則導言中，竟被論證成是觀念差異與天性使然，人口販子從事交易的效率，讓「有關單位」卸去了當時辦案不力的責任，也讓原住民少女固著在他者的論述裡。

範例五呈現的是勞資衝突的新聞導言，在這則簡短的導言中，代表勞方的「被免職員工」，連繫的是「抗爭」、「指責」等攻擊性辭彙，代表資方的台塑所連繫的則是平和的「表示」等辭彙，特別是以「所作決定一切合法」的資方言說，形成了鮮明的衝突／和平的對照，特別是其中涉及臺塑「非法解僱」、「未付資遣費」的部分，都被配置在抗爭勞工的指控中，相對應於臺塑的合法強調、不被逼迫讓步的聲明，巧妙透過理性／非理性、合法／非法的操縱，將勞工推向他者的位置。

範例六則是典型的將女性刻板印象化的產物。一項針對大專女生實施軍事訓練的活動，成為將特定女兵標籤化為美女、英雌，圈選「成功嶺之花」的花絮，再加上吳京部長要留作媳婦的玩笑話，龐嘉綾與大專女兵在這則導言中，成為典型的美學對象，軍事訓練的所有背景全被抽離，龐嘉綾被以強調容貌的「女體迷思」及強調為人作嫁「媳婦」的「母性迷思」所包圍，相較於往昔，男性大專兵上成功嶺強調其雄壯威武、對國家效忠的形象，形成強烈的對比。

範例七則是再現原住民遭遇搶劫反抗的新聞，受害者特別被標誌其原住民身份，還特別附加其「來自蘭嶼」，而持刀搶劫的搶犯則未標誌其漢人身分，同時在搶劫行動的語言表達中還被形構為「反遭殺死」的被動語態，原住民的刻板印象雖未明示，卻已隱入預設中。

由上述七例看來，顯示台灣有諸多社會角色被再現為「他者」。他們被刻板印象化，被標籤化，甚至被污名化，他們大部分在媒介的再現中無法發聲，也不擁有優勢的發言位置，因而處在一種被建構、被塑造、甚至被發明的劣勢處境，而透過語言學的分析、符號學的詮釋、以及後結構主義歷史或社會學的批判，我們可以逐一的揭露

這些他者被再現的形式、策略與後設的歷史與權力機制，而這種揭露過程也同時呈現了他者基於階級、性別、年齡、職業、族群、種族、宗教的差異下，在語言、文化、經濟等資源分配上的不平等（Kress, 1996: 16）。可以說，他者的再現議題，其實是一種「再現的政治」的議題，他者在媒介文本中被建構，同時也再現了我群與他者的支配關係，而透過不同進路解讀他者在媒介文本中如何、為何被再現，重建他者的主體性，甚至嘗試改革他者不平等的處境，其實也是媒介批判工作者的政略（political projects）之一。

### 參考書目

- 盛寧（1997）：《人文困惑與反思：西方後現代主義思潮批判》。上海：三聯。
- Bell, Allan and Garrett, Peter (Eds.) (1998). Approach to Media Discourse, Oxford and Malden: Blackwell.
- Bennette, Tony (1982). 'Media "reality", signification', in M. Gurevitch, T. Bennett, J. Curran & J. Woollacote (Eds.)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London & New York: Methuen, 287-308.
- Berger, Arthur Asa (1992)：《媒介分析分法》，黃新生譯。台北：遠流。
- Berger, Arthur Asa (1995). Cultural Criticism: A Primer of Key Concepts, Thousand Oaks: Sage.
- Bignell, Jonathan (1997). Media Semiotics,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 Brokes, H. Jean (1995). "'Suit, tie and a touch of juju"----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Africa: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news on Africa in the British press', Discourse & Society, 6(4): 461-494.
- Caldas - Coulthard, Rosa, Carmen & Coulthard, Malcolm (1996). Text and Practices: Reading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Campbell, Christopher P. (1995). Race, Myth and the News, Thousand Oaks: Sage.
- Dant, Tim (1991). Knowledge, Ideology and Discourse: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Faircolough, Norma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 Faircolough, Norman (1995). Media Discourse, London & New York: Edward Arnold.



- Fiske, John (1990) : 《傳播符號學理論》, 張錦華等譯。台北：遠景。
- Flowerdew, John (1997). the discourse colonial withdrawal: a case study in the creation of mythic discourse, *Discourse & Society*, 8(4): 453-478.
- Foucault, M. (1980). Power/ 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C. Gordon (Eds.),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
- Fowler, Roger (1991). Language in the News: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he Pres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Hall, Stuart (Ed.) (1997).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 Hartly, John (1982). Understanding News.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 Hartley, John (1984). 'Out of bounds: The myth of marginality'. in L. Masterman (Ed.) Television Mythologies: Stars, Shows and Signs, London: Comedia, 118-127.
- Howarth, David (1995). 'Discourse theory' in D. Marsh & G. Stoker (Eds.), 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Hampshire & London: Macmillan.
- Kress, Curther (1996). 'Representa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Questions for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in Caldas - Coulthard R. Carmen & M. Coulthard (Eds.) Texts and Practices: Reading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pp.15-31.
- MacDonald, Myra (1995). Representing Women: Myths of Femininity in the Popular Media, London & New York: Edward Arnold.
- Mehan, Hugh (1997). 'The discourse of the illegal immigration debate: a case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Discourse & Society, 8(2): 249-270.
- Mills, Sara (1997). Discours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Riggins, Stephen Harold (Ed.) (1997). The Language and Politics of Exclusion: Others in Discourse, Thousand Oaks & London: Sage.
- Said, Edward W. (1997). Covering Islam: How the media and the Experts Determine How We See the Rest of World. New York: Vintage.
- Said, Edward W. (1978).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 Spurr, David (1994). The Rhetoric of Empire: Colonial Discourse in Journalism, Travel

Writing, and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Tolson, Andrew (1996). Mediations: Text and Discourses in Media Studies, New York: Arnold.

van Dijk, Teun A. (1991).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news as discourse' in Klaus B. Jensen & Nicholas W. Jankowski (Eds.) A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ies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pp. 108-120.

van Dijk, Teun A. (1995), 'Discourse semantics and ideology' in Discourse & Society, 6 (2): 243-289.

van Leeuwen Theo (1996). 'The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 actors', in Carmen R. Caldas - Coulthard & M. Coulthard (Eds.), Text and Practices: Reading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32-70.

Wodak, Ruth (1997). 'Das Ausland and anti - semitic discourse: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the other' in Stephen H. Riggins (Ed.) The Language and Politics of Exclusion: Others in Discourse, Thousand Oak & London: Sage, pp. 65-87.

#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s: Negative Constructions of the Other in the Popular Press

Yen-Yuan Ni \*

## ABSTRACT

Upon the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to meaning in language, this article surveys the contributions of a variety of disciplines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others in relation to the media text. There are three perspectives to explaining how representation of the 'other' through language works. The first perspective comes from critical linguistics which treats media texts as built out of choices from within available systems of options in vocabulary, syntax, semantics and so forth, and that such choices are potentially ideological significant. The second perspective comes from semiotics which treat media texts as signifiers in 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 And the third perspective investigates the context that shapes media texts in terms of rules and practices that produced meaningful statements and regulated discourse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ese perspectives about representations of the 'other'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since they refer to different levels of analysis--the linguistic, the social,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levels respectively. This paper ends by analyzing several news leads drawn from different periods of Taiwan press. the analysis illustrates how the other is constructed, invented, marginalized and even stigmatized. It also pose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re is a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media.

Keywords: representation, other, myth, stereotype, discourse

---

\* Dr. Ni Yen-Yua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Ming Chu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